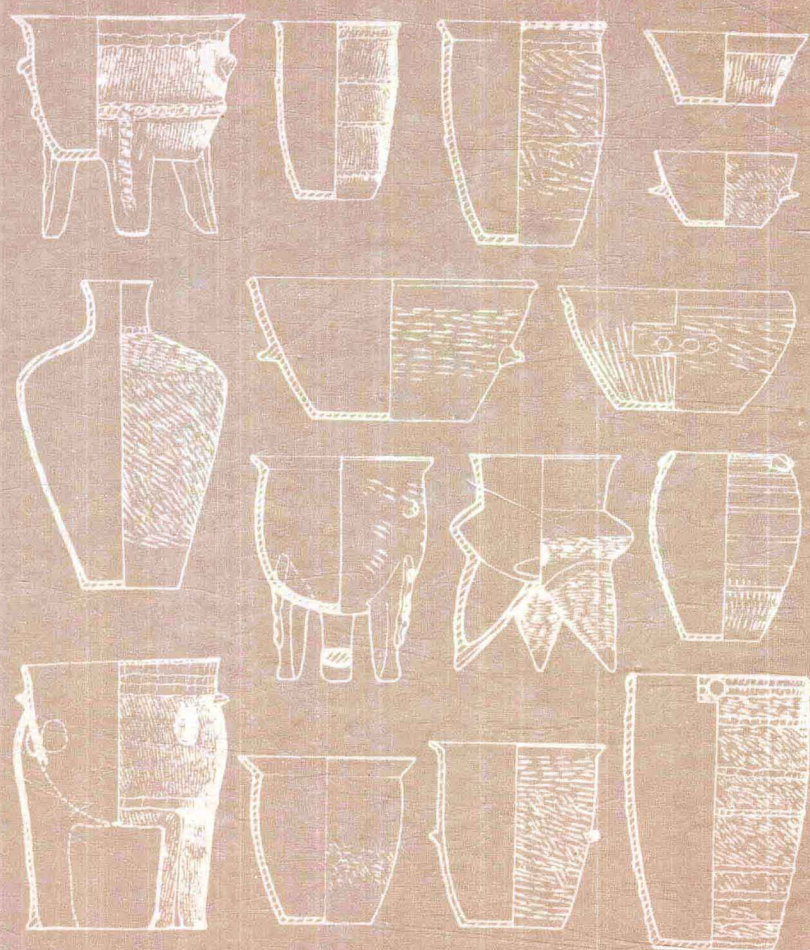


◎ 戴向明 著

陶器生产、聚落形态 与社会变迁

——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



文物出版社

◎ 戴向明 著

陶器生产、聚落形态 与社会变迁

——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 陈 杰

责任编辑 杨新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
时代的垣曲盆地/戴向明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4
ISBN 978-7-5010-2931-0

I. ①陶… II. ①戴… III. ①陶器（考古）—山西省—
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IV. ①K87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424 号

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

——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

戴向明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12. 25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931-0 定价：128. 00 元

前 言

本书根据我的博士论文“Pottery Production,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Yuanqu Basin, North-Central China”翻译、修改而成。书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做了大量的增、删、补、正等修改工作。

2002 年，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当然也经过自己的一番艰苦努力，我得以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拉楚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2005 年学成回国。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刘莉教授。在成行之前，刘老师就根据我当时的工作经历和掌握资料的情况，帮我初步拟定了垣曲陶器研究这样一个主攻方向。考虑到陶器生产的研究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所以后来理所当然地又加进了通过聚落形态重建社会组织的内容。入学之后，我又在刘老师的建议下，根据垣曲资料的特点对将要研究的具体内容做了调整和精简，并确定了后来这个论文题目。

我自 1993 年从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到 2002 年出国留学之前，一直在山西垣曲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期间参与了古城南关遗址的发掘，并经常得以观察、揣摩垣曲工作站里存放的古城东关和南关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后来还直接参与了垣曲盆地聚落考古调查的设计和组织实施。因此当时以垣曲盆地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应该是恰当的选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聚落考古在中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也是我本人极感兴趣和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并且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这首先与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严文明先生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博士研究生导师刘莉教授也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我都受益匪浅。迄今中国考古学在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在此不必多赘。

至于陶器研究，具体到本书而言为陶器生产的研究，当时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而陌生的课题。应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言，中国学者对于陶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形态特征、工艺技术和功能用途等方面，而在生产方式、经济组织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理论的建设尤显不足。特别是在生产的直接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如何通

过器物本身所能提供的各种信息，运用统计学的手段对这些间接证据进行分析而推出有关的认识，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更是乏见。这样一个几乎是全新的领域对我构成了很大的挑战。读书时通过英文资料硬啃考古统计学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而短短三年的学习与写作，到头来吃下的恐怕还是一口夹生饭，其中的得与失只能由读者去评判。

西方（这里主要指我们通过英语途径所了解的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有关陶器生产与分配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探讨陶器生产组织、专业化发展与社会复杂化关系为核心，逐渐发展起了许多理论与方法论模式，出现了许多的研究范例。而由普鲁登斯·赖斯（Prudence M. Rice）和凯茜·考斯汀（Cathy L. Costin）所建立发展起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与方法更是为陶器研究（乃至可以推广到其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树立了经典的模式（参阅本书第四章）。这些模式（model）相互交融发展，共同探讨相关的问题，便形成了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paradigm）。就整个考古学而言，这是近几十年学科逐步走向科学化的结果。模式的建立、范式的形成，意味着学科发展的变化与成熟，但同时还可能意味着有走向僵化的开始。如何突破已有的模式束缚，建立发展新的学科范式，这不是像我这样刚刚开始接触这一研究领域的人所能做到的。老实说，对于陶器生产与分配的研究，本人尚处在学习、了解、探索的阶段。因此，在这里只能运用那些被认为已发展成熟、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来分析垣曲的陶器，只是尽量做到有选择、有分析地运用，有所取舍、有所综合，并尽量将中国考古学传统中有关陶器研究的优秀方法和观念吸纳融合到本研究中。这样尽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本书还谈不上有什么创新，但与已有的研究相比也绝非完全雷同。

本研究借用了西方考古学研究成果中的许多“模式”。举其要者，比如有关社会进化的理论。继塞维斯（Service）经典的社会进化模式（游团—部落—酋邦—国家）之后，基于对他的批评或修正，近二十几年在西方又涌现出了许多新的进化理论或模式（详见本书第二章）。但经过仔细辨析，本书仍采用了重被定义或理解的诸如部落、酋邦，或与之相应的一些新的社会组织类型或进化阶段的概念。事实上，近年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在中国考古学界也对这些概念的准确性或适用性提出了诸多质疑，歧义颇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尚没有出现可以完全取而代之并被普遍接受的新的理论与概念系统。而且，中国一些主要地区的考古资料似都适用从小规模的平等社会（如游团和部落/地方团体）经由大规模复杂的分层社会（如酋邦）再到国家的典型的发展模式（国家的出现有原生型的，也有次生型的），我们近年在晋南垣曲盆地和运城盆地完成的聚落考古调查项目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管本书所用的概念或理论模式有着怎样的局限性，但有关垣曲盆地早期社会发展轨迹及其总

的变化过程的重建是我们颇感自信的成果。再比如，本书在进行宏观聚落分析时，使用了聚落分级与整合性评估（等级—规模分析）的数理统计模式。聚落等级的划分及其社会组织含义在中西都被普遍运用，这在聚落考古中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不仅可以被现代聚落形态所证明（省、市、县、乡、村的级别与规模相对应），而且也被已发掘过的众多史前及先秦遗址所证明（高等级的聚落多为大型聚落，反之亦然）。又比如，本书在进行陶器分析时采用了赖斯和考斯汀的理论模式。也许简单使用诸如家庭生产、家庭工业、个体作坊工业和核心作坊这几种生产组织形式不足以涵盖或准确描述相应的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本书所探讨过的几个社会或发展阶段里，从早至晚陶器生产的专业化及其造成的标准化程度经历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而这又与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变化相关联（但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这一点又是本书颇感自信的另一主要成果。总而言之，虽然我们所使用的有关理论模式和概念可能存在各种局限性，但它们却可帮助我们认识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些实质内容和规律。

在系统地接触西方考古文献不久，我的一个最深感触就是处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模式”。中国学术界，至少是在考古学界，对于西方学术中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模式”始终心存芥蒂乃至抵触反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与“教条”相等同。即使有人在某个研究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也不愿意将之归于或总结为某种模式，深恐有“教条化”之嫌。这很可能与我们在以前数十年中深受教条之苦有关，由此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而在西方学术界恰恰相反，“模式”随处可见，似乎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展自己的模式；一个模式一旦站住了脚而被广泛认可，人们就会纷纷征引运用，但细辨之，真正不加分析、直接拿来套用的并不多见（至少很少有人自己这样声明）。因此，“模式”本身并非可怕和有害，可怕和有害的是不加分析、不加辨别、削足适履地简单套用。早几十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学术都有过这种深受教条主义之苦的惨痛教训。其实，即便我们不标榜使用什么模式，实际的研究却也几乎无不在“模式”之中。任何一种研究几乎都离不开某种理论或方法论基础，这些理论和方法论其实就是“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它们或彰显于前，或隐含于后；学者们或创建自己的模式，或使用他人的模式，学生们则很多“套用”自己老师的模式。可以说，“模式”无处不在。

对于如何看待“模式”，著名的陶器研究学者普鲁登斯·赖斯有过一段论述^①，这里不妨转述如下：

模式是一种启示性的策略手段，它使实际的情形简化并在一定的学科内提供一个

① Rice, Prudence M., 1981, Evolution of Specialized Pottery Production: A Trial Model. *Current Anthropology* 22 (33):238.

“可部分准确预言的框架”。因为模式简化了现实，所以它们并不涉及现实世界中变化的所有方面，也不解释所有的事例。某一个别相反的事例也不会使一个模式失效。模式的贡献在于帮助考察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资料收集策略的不足。模式的建立、检验和提炼是一个学科的本质所在，并且也是理论和资料收集得以连接的程式。然而，有关模式需要牢记的重要一点是，因为它们是完全化的，所以在它们所探讨的现实各方面是有选择的。因而不只允许而且也希望有多个模式适用于某种情形的不同方面。很明显，有比较好的模式，也有比较差的模式。在一系列彼此争胜的模式中某些可能会被认为“更好”，那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形下基于其广泛性、预期性、有效性或准确性，可以说它们更加强大有力。

显然，模式不是万能的，没有能够包罗万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一个优秀的模式至少对于我们认识事物有启示作用，或为相关的分析研究提供有效的途径或手段。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来处理、运用有关模式的。

本书是在西方考古学语境下所做的学位论文，遵循的是西方标准的博士论文写作“格式”。在具体分析材料之前，除了开宗明义首先要交代研究的目的、讲述该研究领域的简史、相关的背景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大篇幅论述、辨析本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方面的内容常常需要单列章节讨论。这种程式化的格式几乎已成为西方博士论文（至少考古学科如此）的“八股”，其实也是学术论文普遍的写作习惯。于考古界而言，不知这种格式的形成是否与“新考古学”倡导“演绎法”有关，对此笔者未及细加推究考证。但这种普遍的现象却可反映西方学术对于“理论”的重视，也可看出中西学术研究传统的差异。至于孰优孰劣，还是各擅其长，对此有兴趣者不妨深入考究，也不失为比较学术研究的一个有趣话题。

形式上的问题且不去管它，要紧的是研究的内容。这方面的好坏得失明眼的读者自会洞察。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本人深感三年的学习研究结下的仍是一颗青涩的果实，其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只得留待将来改进了。文中凡有任何不妥、不当之处或错误，皆由本人文责自负。

目 录

前言	(9)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学术背景	(1)
第二节 垣曲盆地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3)
第三节 垣曲盆地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5)
第四节 研究的程序、路径和本书的结构	(7)
第二章 社会进化与聚落形态：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9)
第一节 单线进化对多线进化论：社会进化的过程	(10)
第二节 单因对多元性的解释：社会进化的动力	(14)
第三节 聚落考古：研究社会复杂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17)
第四节 小结	(21)
第三章 垣曲盆地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22)
第一节 资料的获取与利用	(23)
第二节 裴李岗时期	(25)
第三节 仰韶早期	(27)
第四节 仰韶中期	(32)
第五节 仰韶晚期	(38)
第六节 庙底沟二期	(41)
第七节 龙山时期	(45)
第八节 二里头时期	(49)
第九节 二里岗时期	(52)
第十节 总结与讨论	(58)

第四章 陶器生产模式解析：理论、方法与资料	(62)
第一节 生产方式、专业化与社会复杂化	(62)
一 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结构	(62)
二 专业化	(65)
三 考察专业化或生产组织的一个模式	(67)
第二节 确认生产方式或专业化的途径	(72)
一 直接证据	(72)
二 间接证据	(73)
三 标准化、多样性与专业化	(74)
四 标准化与多样性的测定	(77)
第三节 资料收集	(79)
一 陶器资料的来源	(79)
二 分析单位的确立	(80)
三 陶器的分类	(81)
四 陶器的测量与记录	(82)
五 标本量大小问题	(85)
第四节 小结	(87)
第五章 古城东关仰韶早期：部落社会里的陶器生产	(88)
第一节 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	(88)
第二节 陶器生产的间接证据	(94)
一 陶器的分类与组合结构	(94)
二 名称性资料分析	(95)
三 数字性资料分析	(99)
第三节 小结	(104)
第六章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酋邦社会里的陶器生产	(106)
第一节 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	(106)
第二节 陶器生产的间接证据	(115)
一 陶器的分类与组合结构	(115)
二 名称性资料分析	(117)
三 数字性资料分析	(128)

第三节 小结	(134)
第七章 古城南关二里头和二里岗期：国家社会里的陶器生产	(136)
第一节 陶器生产的直接证据	(136)
第二节 陶器生产的间接证据	(147)
一 陶器的分类与组合结构	(147)
二 名称性资料分析	(154)
三 数字性资料分析	(159)
第三节 小结	(165)
第八章 结语	(167)
第一节 社会复杂化发展的轨迹	(167)
第二节 陶器生产方式的变化与专业化的发展	(168)
第三节 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复杂化	(171)
第四节 存在的问题	(172)
附表 垣曲盆地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登记表	(174)
后记	(176)
英文提要	(179)

插图目录

图 1-1	垣曲盆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3)
图 1-2	垣曲盆地的地形图	(4)
图 2-1	遗址等级—规模分布曲线示例	(20)
图 3-1	垣曲盆地新石器至早商遗址的分布	(24)
图 3-2	垣曲盆地裴李岗期遗址的分布	(26)
图 3-3	垣曲盆地仰韶早期遗址的分布	(28)
图 3-4	垣曲盆地仰韶早期聚落规模—频率直方图	(29)
图 3-5	垣曲盆地仰韶早期聚落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29)
图 3-6	古城东关遗址地形及发掘区的划分	(30)
图 3-7	古城东关遗址Ⅳ区部分东关Ⅰ期遗迹分布图	(31)
图 3-8	垣曲盆地仰韶中期遗址的分布	(33)
图 3-9	垣曲盆地仰韶中期聚落等级划分	(34)
图 3-10	垣曲盆地仰韶中期聚落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34)
图 3-11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陶鹰鼎	(36)
图 3-12	垣曲小赵遗址 F1 平面图	(37)
图 3-13	垣曲盆地仰韶晚期遗址的分布	(40)
图 3-14	垣曲盆地仰韶晚期聚落等级划分	(40)
图 3-15	垣曲盆地仰韶晚期聚落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41)
图 3-16	垣曲盆地庙底沟二期遗址的分布	(43)
图 3-17	垣曲盆地庙底沟二期聚落等级划分	(43)
图 3-18	垣曲盆地庙底沟二期聚落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44)
图 3-19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ⅢH63 平、剖面图	(45)
图 3-20	垣曲盆地龙山时期遗址的分布	(47)
图 3-21	垣曲盆地龙山时期聚落等级划分	(47)
图 3-22	垣曲盆地龙山时期聚落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48)
图 3-23	古城东关遗址龙山时期ⅠM5 平、剖面图	(48)

图 3-24	垣曲盆地二里头时期遗址的分布	(50)
图 3-25	垣曲盆地二里头时期聚落等级划分	(50)
图 3-26	垣曲盆地二里头时期聚落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51)
图 3-27	古城南关二里头期聚落的轮廓	(52)
图 3-28	垣曲盆地二里岗时期遗址的分布	(53)
图 3-29	垣曲盆地二里岗时期聚落等级划分	(54)
图 3-30	垣曲盆地二里岗时期聚落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54)
图 3-31	古城南关二里岗期城址的轮廓	(55)
图 3-32	古城南关二里岗期 M16 平面图	(56)
图 3-33	古城南关二里岗期 H353 平、剖面图	(57)
图 4-1	垣曲陶器大小变量测量示例	(83)
图 4-2	古城南关二里岗下层陶鬲口径 CV 值 (变化系数) 随不同标本数而 发生的变化	(86)
图 5-1	古城东关 I 期陶垫子 (IVH126:88)	(88)
图 5-2	古城东关遗址东关 I 期陶窑的分布	(89)
图 5-3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仰韶早期聚落及陶窑的分布	(91)
图 5-4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早期聚落及陶窑的分布	(93)
图 5-5	古城东关 I 期陶器分类 (一)	(95)
图 5-6	古城东关 I 期陶器分类 (二)	(96)
图 5-7	古城东关 I 期各类陶器数量的分布	(97)
图 6-1	垣曲丰村和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制陶工具	(107)
图 6-2	垣曲宁家坡遗址庙底沟二期陶窑 Y501、Y502	(107)
图 6-3	垣曲宁家坡遗址 Y501 平、剖面图	(108)
图 6-4	古城东关遗址Ⅲ区所见庙底沟二期陶窑及相关遗迹的分布	(110)
图 6-5	古城东关遗址Ⅲ Y4 平、剖面图	(111)
图 6-6	古城东关遗址Ⅲ H22 平、剖面图	(112)
图 6-7	古城东关遗址Ⅲ H11 平、剖面图	(113)
图 6-8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早段陶器分类 (一)	(116)
图 6-9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早段陶器分类 (二)	(117)
图 6-10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中段陶器分类 (一)	(118)
图 6-11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中段陶器分类 (二)	(119)
图 6-12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晚段陶器分类 (一)	(120)
图 6-13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晚段陶器分类 (二)	(121)

图 6-14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早段各类陶器数量的分布	(121)
图 6-15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中段各类陶器数量的分布	(122)
图 6-16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晚段各类陶器数量的分布	(122)
图 7-1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制陶工具	(137)
图 7-2	古城南关遗址 Y6 平、剖面图	(138)
图 7-3	古城南关遗址 Y9 平、剖面图	(139)
图 7-4	古城南关商城的轮廓、宫殿区的位置及二里岗上层陶窑的分布	(140)
图 7-5	古城南关遗址出土二里岗期玉器和青铜器	(143)
图 7-6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岗上层 M40 出土陶器	(144)
图 7-7	古城南关出土二里岗期陶礼器和原始瓷器	(145)
图 7-8	古城南关二里头晚期陶器分类 (一)	(148)
图 7-9	古城南关二里头晚期陶器分类 (二)	(149)
图 7-10	古城南关二里岗下层陶器分类 (一)	(150)
图 7-11	古城南关二里岗下层陶器分类 (二)	(151)
图 7-12	古城南关二里岗上层陶器分类 (一)	(152)
图 7-13	古城南关二里岗上层陶器分类 (二)	(153)
图 7-14	古城南关二里头晚期各类陶器数量的分布	(153)
图 7-15	古城南关二里岗下层各类陶器数量的分布	(154)
图 7-16	古城南关二里岗上层各类陶器数量的分布	(154)
图 7-17	东关 I 期、庙底沟二期、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主要陶器口径、底径、器高及口径/器高 CV 值变化范围比较	(164)
图 7-18	东关 I 期、庙底沟二期、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主要陶器口径、底径、器高及口径/器高累积资料 CV 值变化范围比较	(165)

插 表 目 录

表 4-1	四个文化期的阶段划分和时间跨度	(81)
表 5-1	古城东关 I 期各类陶器的数量与比例	(97)
表 5-2	古城东关 I 期五类陶器标本大小变量的平均值 (mean)、标准偏差 (SD) 和变化系数 (CV)	(100)
表 5-3	古城东关 I 期早、晚段之间五类陶器的变化分析 (ANOVA)	(102)
表 6-1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各类陶器的数量与比例	(123)
表 6-2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三个阶段陶器颜色统计与对比	(124)
表 6-3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三个阶段主要陶胎质地统计与对比	(125)
表 6-4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五类陶器陶胎质地的成分	(125)
表 6-5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三个阶段器表纹饰统计与对比	(126)
表 6-6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八类陶器器表装饰组成	(127)
表 6-7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三类陶器大小变量间的关联系数	(129)
表 6-8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三阶段之间四类陶器的变化分析 (ANOVA)	(129)
表 6-9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八类陶器标本大小变量的平均值 (mean)、 标准偏差 (SD) 和变化系数 (CV)	(130)
表 7-1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各类陶器的数量与比例	(155)
表 7-2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三个阶段陶器颜色统计与对比	(156)
表 7-3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三个阶段主要陶胎质地 统计与对比	(156)
表 7-4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五类陶器陶胎质地的成分	(157)
表 7-5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三个阶段器表纹饰统计与对比	(157)
表 7-6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五类陶器中经慢轮修整 器物的数量和比例	(158)
表 7-7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五类陶器大小变量间的 关联系数	(159)

表 7-8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晚期和二里岗下层之间四类陶器的 变化分析 (ANOVA)	(160)
表 7-9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之间五类陶器的 变化分析 (ANOVA)	(160)
表 7-10	古城南关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期五类陶器标本大小变量的平均值 (mean)、 标准偏差 (SD) 和变化系数 (CV)	(16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学术背景

本书着重于讨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山西垣曲盆地内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的变化。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试图重建垣曲盆地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的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揭示陶器生产方式随时间推移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考察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变化同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依据资料的特点,陶器生产的分析集中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期的早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5000~前1300年)。

垣曲盆地位于山西与河南交界之处,大部居于山西境内、黄河北岸,临近中原腹地。这里过去二十几年的考古工作积累起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为本地区聚落形态和手工业生产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和可行的条件。

中国考古学自20世纪20年代发轫至80年代的几十年时间里,主要从事的是文化发展史的重建。但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经济贸易、意识观念等方面,并有了越来越深入的探讨。尤其是聚落考古的勃兴,极大地促进了对早期政治组织、社会结构演变的研究,推进了对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认识。

聚落形态研究,或称聚落考古学,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考古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并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如中东、中美、北美等地)得到了成功的应用。这一方法对研究社会政治组织的变化和复杂社会的进化过程极富成效^①。在中国,聚落考古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规模发掘^②,以及后

① Sabloff, Jeremy A. and Wendy Ashmore, 2001, An Aspect of Archaeology's Recent Past and its Relevance. In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 edited by Gary M. Feinman and T. Douglas Pric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11-37.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来围绕仰韶早期亲属组织和社会关系的一些讨论。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聚落考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到 80 年代，随着姜寨等一批保存状况好、发掘规模大的聚落址的报道^①，及相关研究成果的问世^②，聚落考古开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聚落考古在中国的真正发展滥觞始自 90 年代，这一方法开始被人们有意识地广泛运用于田野考古实践中。一些保存良好的史前居址被大规模揭露。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关注区域聚落考古调查以及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实际展开了在区域层面上的聚落形态的调查和研究工作^③。此外，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几项中外合作的田野考古项目采用了全覆盖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聚落形态的考察来揭示一个地区内长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④。目前，聚落考古在中国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大发展期。

近几十年，特别是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手工业生产的研究已发展为西方考古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门类，而这一领域内的众多研究又涉及社会政治结构^⑤。在手工业生产研究中，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所探讨的一项突出内容。大量的研究讨论了标准化、专业化和社会复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陶器研究领域^⑥。在中国，以前对手工业产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形态、技术和功能用途等方面，而在生产方式、经济组织及与政治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但在最近几年，一些考古学家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手工业生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⑦。同时，有几位西方学者在对几个地区的研究中也探讨了手工业生产与社会政治形态的相互

①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② 严文明：**a.** 《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考古与文物》1981 年 1 期。**b.** 《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③ 如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

④ Liu, Li and Xingcan Chen, 2001, Settlement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China.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22(2): 4-21.

⑤ Costin, Cathy L., 2001, Craft Production Systems. In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 edited by Gary M. Feinman and T. Douglas Pric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73-328.

⑥ Rice, Prudence M., **a.** 1991, Speci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ty: A Retrospective. In *The Ceramic Legacy of Anna O. Shepard*, edited by Ronald L. Bishop and Frederick W. Lange.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57-279. **b.** 1996, Recent Ceramic Analysis: 2. Composition, Produc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4(3): 165-202.

⑦ 如 **a.** 张弛：《大溪、北阴阳营和薛家岗的石、玉器工业》，《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 年。**b.** Liu, Li, 2003, "the Products of Minds as Well as of Hands": Production of Prestige Goods in the Neolithic and Early State Periods of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42(1): 1-40.